

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的新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其中最为重要的表征就是社会迅速分化,利益关系重组,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描述和分析这种巨大转型,是中国社会学者的重任之一。近年来,社会分层领域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大研究主线,一是围绕着“市场转型理论”争论,分析和探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收入分配机制的变迁,主要是回答“谁得到,谁失去,为什么”的问题。第二条研究主线是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的结构分化和阶层分类,以描述和展现转型期中国的阶层结构图景。李路路教授和秦广强博士等合著的《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一书正是第二个研究主线的一本代表性论著。

该书总体聚焦三大议题。第一部分属于阶级或阶层结构研究,作者继承或借鉴了国内外关于社会分层与阶级研究中与权力、权威相关的理论传统和经验成果,在财产所有权和组织权威(雇佣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权威阶级体系,并以此来描述和展示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市场化和工业化共同演进的过程。一方面,市场化进程将使“财产”或“生产资料(财产)的占有”或韦伯意义上的“市场能力”成为划分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或阶层地位的重要标准,而另一方面,工业化的进程则意味着工作组织对个体生活机会的影响愈发重要,因此在探讨个体的阶层地位的时候不能忽略工作组织中的“权威关系”或“雇佣关系”。而这正是作者提出将“组织”召回分层结构研究中的重要理由。由于它紧扣当前中国的城市社会,而且强调工作组织与个体生活机遇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有着尤其独特的生命力,而且可以和被广泛关注的“单位制”研究传统以及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进行理论和经验对话。

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阶级图式包括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体系和以戈德索普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阶级体系(简称EGP);国内学界的阶级划分则有陆学艺教授基于工业化理论提出的“十大阶层”、刘欣教授基于制度主义理论提出的“五大阶层”和林宗弘与吴晓刚教授提出的中国版的新马克思主义分类体系。而该书所提出的“权威阶层分类体系”,可以说是与已有研究相并肩的重要成果。该体系不仅有很深的理论渊源,而且符合中国的现实。

与前六章宏观全景式地描画和分析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图景不同,该书的第二部分则将镜头缩小,聚焦于中国城市地区快速成长的“中产阶级”。作者敏锐地结合中间阶层特征和功能的“多面性”以及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进程,指出转型期中国的中间阶层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作者区分了两类中间阶层,一类是从再分配体制中延续下来的中产阶级群体,另一类是市场改革之后新生的中产阶级。作者的分析发现,前者在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方面都更为保守,而后者更为积极和前卫。这种划分对理解中国的中间阶层的特征及其社会政治功能非常富有启发性,是关于中国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研究的重要创新。

该书的第三部分将讨论的焦点转向分层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不平等的主观感知”。前面探讨的是中国城市居民客观的阶层地位及其表征,是根据客观的标准对个体进行阶层划分(考察个体实际获得的地位),而这一部分探讨个体对自身的阶层定位以及他们对不平等的判断和态度(考察个体主观认为的“应得”的地位)。这种主观分层研究在当前中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市场改革、利益重组和社会分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当代中国的客观社会不平等程度呈上升趋势,而民众对此也越来越表现出不安和不满的情绪,导致“冲突感”和“冲突行动”增加,从而对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在这一部分,作者巧妙地使用“实得”和“应得”收入这对指标来考察民众对社会不平等的感知和对社会公平的判断,发现当前中国居民虽然已经摒弃再分配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分配观,但对超出合理程度的收入差距扩大持非常否定的态度。尤其是处于底层的民众,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

无论是国际还是中国学术界,社会分层研究都是以定量分析为主导的。作为分层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该书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该书既有理论的梳理和创新,也有权威经验数据的支持,研究设计合理巧妙,分析和讨论层层递进,可读性强。作者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收集的权威数据资料,使用最前沿的数据分析方法和统计模型进行处理和分析,从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整体性结论。沿用整体性、结构性的视角,理论、观点和经验调查数据的有机结合,是社会学引以为豪的特色之一,也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该书收入了作者不同年代发表的若干论文,这表明该书的主要观点和研究结论是作者长时间思考和持续研究的结果,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然这样做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例如,作为该书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权威分层体系”——并没有被作者融入到后面两部分(中间阶层和主观不平等)的分析当中。而关于中间阶层的部分,作者也没有将他们创新性的“内源性”和“外生性”的中间阶层分类(第七章)贯穿于关于中间阶层研究的其他章节(第八至第十章)。这不失为一种遗憾。另外,该书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方面是对大型调查数据的使用,全书所有的数据资料都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如果作者能在书中增加专门的段落介绍该调查的发展历史和数据一些基本情况(如抽样方法、样本量和基本的样本分布),将有利于读者对全书所依赖的经验依据的综合了解。

总体而言,该书是社会分层领域的学者和学生不可错过的一本重要著作,它不仅“全景式”地介绍了分层研究领域的历史脉络、重要理论和前沿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当前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有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另外,它也是分层领域之外的学者甚至包括媒体人和党政部门的工作者理解中国社会或制定有关政策的重要参考书籍。

(作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吴愈晓)

分层研究的张力与魅力

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国际化、专业化发展最快的领域。作为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专业委员会的首任理事长,李路路教授与秦广强博士等最近合著的《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一书,集中收录并重新整理了他们于2010年前后两个阶段完成的研究成果,呈现了该领域过去、当前、将来的重点议题。笔者身为分层研究的后学,从中读出了作者在处理分层研究内在张力时所展现的学术魅力。

一、去理论化 vs. 再理论化

分层研究给学界的突出印象,是重视实证尤其是量化研究,并总在引领社会学界的统计分析方法潮流。但一个隐忧是,方法驱动成为优先考虑,理论发展的地位相对旁落,尤其是在宏大理论很难再统摄日益细分的研究领域这一时代背景下,“去理论化”似乎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这种重实证、轻理论的趋向,偏离了分层研究历来强调理论与实证并重的目标。

在《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一书的前半部分,作者直面阶级分析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上的双重难度,致力于提出全新的“权威阶级体系”来整体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展现出令人佩服的理论化功力和实证严谨性。这一理论与实证并重的研究过程展开得相当耐心和细致,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重要环节。

一是介绍当代阶级研究的理论内核、分析对象、分析思路和解释逻辑,为自己的阶级分析找到方向。二是归纳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两大阶级理论当代转向的共性——从“经济决定”到“权威支配”,为提出自己的阶级图式找到重心。三是阐释权威关系决定(雇员)阶级位置继而再影响态度行为的逻辑原因或因

果机制,为建构“权威阶级”图式找到理论依据。四是(直接)测量权威变量,为“权威阶级”图式实现操作化。五是检验“权威阶级体系”在经验上的关联效度和建构效度。全书的关键创新就是(在理论上)将权威作为构建阶级图式的核心坐标并(在实证上)对其进行直接测量和检验,勿庸讳言,作者做到了。

二、碎片化 vs. 系统化

实证研究的“去理论化”一般会伴随着“碎片化”,具体表现就是不同的研究关注不同的变量间关系。虽然聚焦是开展单项研究和论文写作的重要方式,但分层研究如果只满足于找寻特定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不追求系统化的分析,就难以全面深刻地认识现实社会。然而,《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正是在系统性上给人以深刻印象。

作者选取的阶级分析范式,本身的最大特点或优势就是系统化。在检验“权威阶级体系”的建构效度时,作者呈现了一个系统化的实证分析,包括四大方面、近十类指标、超二十个变量。相比之下,作者对话的其他阶级或阶层图式——包括西方的戈德索普和赖特阶级图式以及国内的陆学艺十大阶层图式、刘欣五大阶层图式和林宗弘与吴晓刚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图式,都没有涵盖经济与社会、客观与主观等各种结果变量。

从书中部分章节的最初发表时间可以看出,作者近十年来一直在系统地思考中国的社会分层问题。2010年之前,主要研究中间阶层(如构成异质性及社会功能彰显等议题),采用的阶层体系仍是“大众化的”职业分类。2010年时,以回顾国内近年来的社会分层研究为契机,开始正视“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之后的两三年内,致力于梳理当代西方阶级分析范式并提出自己的阶级分类图式。其实,“权威阶级”图式的核心思想可追溯至作者2002年的论文和2003年的专著,作者在当时就强调权力支配关系在阶层结构框架中的核心地位。

三、承上 vs. 启下

既然说是分层研究的内在张力,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在展现其处理魅力时也引出了后续研究议题。

首先,正如作者倡导开放性、竞争性的阶级分析那样,他们对中西方其他阶级或阶层图式的批评,尤其是对自己“权威阶级”图式在分类标准“一维性”上胜出的强调,可能会引来理论对手的不同意见。另外,作者使用目前所有阶级图式去分析住房差异时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住房阶级”理论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新的启发?可以预见,新的社会分层图式会不断出现,并展开彼此之间的理论竞争。

其次,作者的研究涉及了许多具体、特定的分支领域,但这些细化领域的文献发展脉络还值得进一步细致梳理。例如,将理论重心落到组织内部的权威关系并对其进行操作化,但组织和劳动社会学近年来关注的劳动关系的非标准化是否会对此造成挑战?不管怎样,这种尝试意味着,分层研究与特定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收获硕果。

最后,在分层研究和量化研究中,数据分析的严谨性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最终会考验研究结论的适当性。从方法史的角度看,新的分析工具和统计模型的出现可能会挑战旧的理论命题和结论。从学科史的角度看,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方法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例如,作者虽然强调长时段的趋势分析,但主要分析的仍是2003年和2006年数据。相信随着中国大型社会调查数据的日积月累,这个方向的研究会不断涌现。

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总是在已有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并成为后人继续向前的阶石。《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以其理论创造性、分析系统性、结论新颖性和领域交叉性,成为观察21世纪前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及其研究进展的透镜,进而为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新常态之下的社会结构变迁奠定了基础。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李骏)

阶层图式：在社会变迁中探寻不变之“硬核”

改革开放近40年,作为社会结构重要基石的阶层结构,在工业化、市场化浪潮推动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何厘清阶层构成的元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分层图式,是科学评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和定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重中之重。

《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是李路路教授及其团队对他们近十年来社会分层研究的一次系统总结和回顾。在30余万字的篇幅中,作为对“重返阶级分析”呼声的有力回应,作者提出了“权威阶级图式”,并在实证层面给出有力验证。

通过对有关权力、权威理论传统的梳理以及既有范式的批判,基于中国社会独特的“工作状况”(组织权威),利用“体力/非体力劳动”、“直接管理下属”、“决策权和管理监督权”以及“工作自主性”等四个指标,构建了包含十类典型群体的阶层图式。该图式以简约的“一维性”标准,较好地描绘了当代中国城市的社会权力结构及其特征,在理论解释上取得了关键性进展。

在笔者看来,权威图式的两大基石——财产所有权和组织权威,恰恰是社会变迁过程中“藏”在阶层地位背后的两大“硬核”。一方面,在阶级分析的理论传统中,基于财产占有的社会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所论及的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还是韦伯谈到的市场交换中因货品占有的利益,都可能对人们的资源拥有、市场机遇等产生实质约束。另一方面,权力/权威一直是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变量。从组织层次而非一般社会的层次建构图式,不仅是对国际社会阶级分析从“经济市场地位”转向“组织权威地位”的呼应,也是对中国单位社会的理论关怀。即使在当下“后单位”时期,单位作为“看不见的手”的角色也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在某些地区和领域还出现了一定的“回潮”趋势。

当然,任何一种阶级图式的提出,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理论困惑。那么,权威图式的立意何在?笔者认为,作者试图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中寻求新的均衡点。阶级分析既适用于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也是分析转型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作者对阶级分析范式和解释逻辑注入了“中国元素”。可以说,权威图式的提出,是在一般性知识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知识的一般化的互动中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然而,在研读相关内容的过程中,笔者有一些新的思考,提出以下三点学术批评。首先,正如刘欣教授所总结的,近40年的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中国市场经济,既包含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延续成分,又包含着新生的市场经济成分,其协调机制呈现“支配二元性”。权威图式试图用组织权威对不同体制内的阶层地位进行“标准化”检定,这可能会“牺牲”不同组织类型中权威的异质性,并对图式的理论效度带来挑战。

其次,权威图式是衡量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尺子”,它和其他“尺子”相比具有诸多优势,但是它们是一种竞争性关系还是互补性关系?换言之,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这些针对“真实”中国社会的“参差不齐”的结果?在经历社会转型的中国,笔者认为停留在统计层面谈论孰优孰劣是不够的,更应该在本体论层面来加以讨论。

最后,如果权威图式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那么它在何种意义上可能从特殊性(adhoc)知识上升至一般性(general)知识呢?在社会科学中,每一种理论都有前提假设,或者说是约束条件。笔者认为,权威图式至少面临两方面的挑战:(1)纵向比较。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财产所有权和组织权威的社会属性很可能是变化的,那么基于此的图式能否科学地定位阶层结构?(2)横向比较。对同样经历社会转型的东欧国家而言,权威图式是否也有一定的适用性?当然,以上几点也是每一位致力于中国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研究的学者所共同面对的挑战。

(作者: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范晓光)